

基地组织现状与发展趋势*

张家栋 朱道运

摘要：“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失去了在阿富汗的大多数营地，一度失去了策划、实施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的能力，被迫向“近敌战略”的方向转型，从袭击美国本身转向袭击美国在中东等地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的盟友。总体来看，基地组织已经失去了核心领导人和很多重要成员，从一个等级制组织转变为一个宽泛的国际圣战网络，但目前对国际社会仍然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关键词：基地组织 现状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5-0039-45

“9·11”事件爆发以前，基地组织主要实施本·拉登所说的“远敌战略”，目标直指所谓的“蛇头”美国。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爆炸案、2000年美国“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以及2011年“9·11”事件，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9·11”事件发生以后，基地组织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阵营的严厉打击，策划、实施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但是，基地虽然已经失去了核心领导人和很多重要成员，从一个等级制组织转变为一个宽泛的国际圣战网络，但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恐怖主义威胁来源。

一、“9·11”后基地组织的演变过程

在“9·11”事件以前，本·拉登及其领导下的基地组织并不是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核心，1996年时只有大约30名核心成员。为了吸引其他圣战分子的关注与加入，拉登曾采取了很多招数：宣布对美国进行圣战，1998年创建“世界反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World Islamic Front for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1998年底策划实施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但都效果不佳。直到2001年，基地组织才正式合并了扎瓦赫里领导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 EIJ），并吸收其几名成员进入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开启了基地内部埃及派与沙特/也门派并立的局面。“9·11”事件爆发以后，基地组织一举成名，成为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旗号与核心。总体来看，从“9·11”事件至今，基地经历了一个从低迷到重新积聚力量并发展壮大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阵营的严厉打击之下，基地组织已从一个中央领导式的、等级制的组织，变成一个混乱的、力量被不断削弱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才一度认为：基地组织已经在行动层面被严重削弱，领导能力也已经严重退化。虽然当时基地仍然视美国为主要目标，但是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周边涉华恐怖组织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CGJ004）的部分成果。

第二阶段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到2007年。随着美国转移了反恐目标,并因进攻伊拉克而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国际恐怖主义运动逐渐汇聚到基地组织大旗之下。在这一时期,基地组织核心重新得到加强,损失了的高级领导人和行动骨干也不断得到补充。更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一方面在巴阿边境地区重新获得了庇护场所,另一方面又通过与其他中东和北非恐怖组织结盟或结成伙伴关系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基地在伊拉克”(Al Qaeda in Iraq, AQI)、“基地在马格里布”(Al 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 LIFG)等,纷纷加入基地或成为基地的合作伙伴。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基地组织活动模式:基地组织核心在训练和行动方面依赖地方分支,而地方分支则依赖基地组织核心的品牌以获得可信度和合法性。

第三阶段从2008年到2010年。随着“基地在阿拉伯半岛”(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的成立并在也门找到了庇护场所,在大量“伊拉克战士”和当地部族武装的滋养下,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基地的活动能力大幅提高。目前,与“9·11”事件时期的基地组织相比,现在的基地组织网络拥有更多的成员、更广泛的分布范围以及更加广泛的袭击目标,其组织结构虽然更加分散,但整体力量却更加强大。^[1]目前,不仅以也门等国家为训练营地的基地组织网络开始恢复对美国 and 西方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一些美国籍的穆斯林也开始被极端化并从事恐怖暴力活动,成为美国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基地组织特别是其核心力量虽然在行动能力上仍然没有恢复到“9·11”事件时的水平,但是其威胁来源和行为主体显然变得更加复杂而多样。

第四阶段为自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出现以后,基地组织面临着如何一个如何将当前形势整合进基地组织意识形态之中的问题。^[2]随着中东安全形势的恶化,基地组织正在利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危机与冲突,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扩大自身影响。在利比亚,前基地组织分支领导人已经成为执政当局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在也门,基地组织分支已宣布成立政府,并建立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并逐步建立了军事武装;在叙利亚,基地组织正在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政府之间的矛盾,通过伊拉克的逊尼派武装参与到叙利亚的内部冲突之中。

二、当前基地组织概况

当前的基地组织已经不是“9·11”之前一个单纯的组织概念,而是发展成为一个由基地组织核心、附属组织、合作组织和非附属恐怖主义小组与个人组成的一个多层次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具体来说,基地组织网络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是基地组织核心(Al Qaeda Core)。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营地被摧毁以后,多数基地领导人转移到巴阿边境地区,被称为基地组织核心。目前,基地组织核心拥有大约200名成员,主要是阿拉伯裔“阿富汗战士”^[3]。基地组织的创建者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是其继任者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等人继续在基地组织核心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基地组织核心的构成也在向阿拉伯人以外的群体开放。美国公民亚当·格登(Adam Gadahn)和阿当南·苏克里居马(Adnan el Shukrijumah)等人曾在基地组织核心中活动,东伊运领导人阿布杜尔·哈克在普和被击毙之前,据说也曾入选基地组织核心的最高决策机构——大苏拉委员会。

第二是基地组织附属组织。这些组织是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出现的,一般从基地组织核心或本·拉登本人那里得到金融支持和思想指导,并把“基

地”放在其名称之中。2004年10月，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领导的“一神教与圣战组织”（Group of Monotheism and Jihad, JTJ）宣布加入基地组织，并改名为“基地在两河国家”（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 QJTR），俗称“基地在伊拉克”^[4]。2006年9月，“萨拉菲宣教和战斗团”（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 GSPC）宣布加入基地组织，并改名为“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2009年1月，纳希尔·瓦赫思（Nasir al-Wuhaysi）领导的“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宣布接受基地组织核心的指挥。另外，哈伦·法祖尔（Harun Fazul）领导的“基地在东非”（Al Qaida in East Africa）等，也成为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有些附属组织的恐怖活动能力甚至比基地组织核心还要强大。“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就曾策划过2009年12月25日的圣诞节炸机阴谋和2010年10月通过货机袭击美国的阴谋，被美国认定为比基地组织核心更加危险的恐怖组织。^[5]基地组织核心对这些附属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必要时还会处罚违令成员。有些附属组织也会主动就重大战略问题向基地组织核心汇报与请求。例如，扎卡维领导“基地在伊拉克”时曾向基地核心领导层申请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约旦。^[6]

第三是基地组织合作组织，主要指与基地有共同或类似的意识形态和活动策略、经常相互响应但不是或尚未成为基地组织附属机构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独立活动并追求自己的目标，需要时与基地组织核心进行合作，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ik-e-Taliban Pakistan）、虔诚军（Lashkar-e-Tayyiba）、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ab）、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东伊运（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和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等，都属于这种合作组织。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或领导人往往也有在阿尔及利亚、巴尔干地区、车臣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争经历，或曾在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接受过相关训练，并与基地组织核心的成员有过接触与联系。但是，不同的合作组织、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与基地组织核心的合作程度并不相同。例如，伊斯兰祈祷团与基地核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联系，双方于1998年达成了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是伊斯兰祈祷团提供后勤支持并从事相关活动，而基地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技术与资金，^[7]但现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不密切。对于基地组织核心来说，这些合作组织的意义在于其拥有更加广泛的、分散的支持群体，能够编织起更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来实现基地组织的总体战略目标。“索马里青年党”于2010年2月宣布支持基地组织核心以后，就把基地组织的成员招募活动拓展到美国本土。2007年以来，该组织从开始在美国明尼苏达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等地的索马里后裔中招募了20多名成员，谢瓦·艾赫穆德（Shirwa Ahmed）还成为美国公民中的第一位人体炸弹。^[8]

第四为非附属恐怖活动小组与个人，是当前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网络中最难以应对的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指受到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感召或在其鼓舞下产生的小型恐怖组织、恐怖活动小组或个人。当前，在欧美国家内部存在着大量本土圣战分子（home grown jihadist）。这些人虽然受到基地组织全球圣战思想的感染，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与基地组织核心没有直接的、有形的联系，处于自我招募、自我极端化、并利用虚拟训练营（virtual training camp）进行自我训练的高度自治状态。^[9]例如，2005年7月英国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的制造者默罕默德·汗（Mohammed Siddique Khan）等英国极端分子虽然曾到巴基斯坦的基地训练营地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但并非基地组织的正式成员。在美国，这种现象也经常出现。2007年5月，一些美国国内圣战分子计划袭击美国新泽西的迪克斯堡（Fort Dix）和其他军事设施；同

年，罗塞尔·德夫雷特斯（Russell Defreitas）领导的一个小团伙计划袭击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有时，这种恐怖分子可能通过网络等途径接受或接触过基地短期的思想与战术训练，甚至与个别基地成员有过联系。2009年11月，在美国胡德堡（Fort Hood）枪击同事的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Nidal Hasan），就与基地组织的狂热宣传鼓动人员奥拉基有过信件往来，但他本人并非基地组织成员，而是根据个人意愿独立行动的。^[10]

2004年，一名叙利亚出生的基地组织分子阿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发表了一份长达1600页的声明——“对伊斯兰抵抗的一个全球呼吁”（A Global Call to Islamic Resistance）。在声明中，苏里认为过去几个伊斯兰武装失败的原因是其等级制的组织结构，要想取得胜利，伊斯兰武装组织要建立体系（niszal/system），而不是组织（organization）；要把各个秘密的、互不相联的、大量的恐怖活动小组整合成一个无中心的，但是有共同目标、共同名称和共同原则的全球性运动。^[11]虽然苏里的声明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基地组织的战略方针，但显示出基地组织目前已开始从一个等级制的、结构紧凑的恐怖组织，演变成为一个多元的、分散的恐怖主义网络或运动。并且，这种新型的基地组织网络或基地组织运动，可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大量涌现的本土极端分子，在法律地位、语言能力和文化技能等方面都拥有传统基地分子所不具备的便利条件，成为欧美国家更难应对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

三、基地组织的发展趋势

自从“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在国际反恐阵营的高压下做过很多尝试，有些成功但也有很多失败。特别是“基地在伊拉克”的兴起与衰落过程，更让很多基地组织领导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斗争战略。“基地在阿拉伯半岛”领导人就认为，“基地在伊拉克”的衰落是因为毫不妥协地在伊拉克推行伊斯兰教法而不顾伊拉克民众的现实需要，导致大部分伊拉克民众对基地产生反感。要想扩大在也门的影响，“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在坚持伊斯兰教法以及反美、反西方原则的基础上，也关注也门当地民众的需求，与也门当地武装力量结盟或融合。在斗争策略方面，基地不仅要坚持传统的暴力活动，还要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种可靠的、可以替代政府功能的选择。^[12]这样，圣战就不仅仅是抽象的意识形态需求，还将成为一种世俗的生活方式。总体来看，基地组织表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结构上出现分散化趋势。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基地组织的指挥与信息网络受到破坏，核心领导人半数以上被打死或逮捕，精神号召力下降，资金状况也在恶化，难以维持传统的等级式组织结构。^[13]特别是本·拉登死亡以后，被拉登个人权威压制下来的基地埃及派与沙特/也门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再次显现出来。埃及派代表人物扎瓦赫里虽然接任了基地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真正能够直接指挥的其实是其班底“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成员，沙特/也门派虽然目前还不会脱离基地组织，但是活动积极性将会下降。^[14]在这种情况下，基地组织的组织结构将更加松散，基地组织核心对分支机构和合作组织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将会更弱。但通过其各独立运作的附属组织、合作组织以及非附属的小组与个人，基地组织网络的恐怖活动也将更难预防。^[15]

第二，活动方面出现当地化趋势。被赶出阿富汗以后，基地组织越来越注重吸收当地人加入基地组织并在当地活动，甚至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当地政治过程。早在2005年，扎瓦赫里就曾致信“基地在伊拉克”的时任头目扎卡维，建议后者改变战略，停止处死俘虏或人

质，谋求在美军撤退以后承担伊拉克政治的领导角色。^[16]在也门，“基地在阿拉伯半岛”正在把基地组织的普世性、全球性意识形态与也门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关注也门的当地问题，声称自己与也门民众站在一起，并试图组建伊斯兰政权和正式的军队，^[17]在2011年宣布在也门正式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在非洲，基地组织分支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当地矛盾，与地方性反叛武装结盟或合作，壮大自身实力及其在当地的影响。^[18]

第三，基地组织在国际恐怖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出现标签化趋势。由于基地组织越来越松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基地组织分支也不一定完全听从基地组织核心的指示，基地组织现在更像是一种标签或意识形态象征。当前，基地组织核心最重要的凝聚力和领导力不是来自其传统的结构优势和资金优势，而是来自于其在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中的代表意义。^[19]在这个意义上，基地就不仅是一个组织名称，还成为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代名词。^[20]

第四，恐怖袭击目标方面出现多元化趋势，不仅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是基地的传统目标，中国、印度等的发展中大国也可能成为基地组织的袭击目标。随着基地组织的分散化和当地化，基地组织核心已经无法为所有成员规定统一的袭击目标。在美国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以后，反美口号在基地组织网络中的重要性也会随之下降，其他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则会相应上升。

第五，恐怖活动动员与人员招募方面出现网络化趋势。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恐怖主义战场的一部分，基地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作为自己的宣传、招募和培训工具。与上世纪90年代基地组织只有一个网站（www.alneda.com）相比，目前基地组织直接和间接运行着数千个网站、论坛和聊天室。^[21]如“基地在阿拉伯半岛”负责发行的网络杂志《战争回声》（Sada al-Malahim/Echo of Wars, SM）大量刊登圣战分子的文章和评论，在基地组织的宣传和招募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2]本·拉登、奥拉基和其他基地核心成员的死亡也没有削弱基地组织在互联网领域的战略优势，基地组织照样可以利用网络对目标群体进行广泛的“脸谱侵略”（Facebook Invasion），招募成员并对其进行训练。^[23]

第六，资金筹集方面出现犯罪化趋势。“9·11”事件以后，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不畅，很多附属组织与合作组织都被迫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开始与犯罪组织合作甚至结盟，其中一些还兼具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的双重属性。在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来自摩洛哥和西班牙本地的基地组织分子就是用66磅大麻（hashish）换取的440磅炸药，造成190多人死亡。^[24]基地组织活动区域往往也会成为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形势严峻的地区。非洲萨赫勒地区是“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的主要活动区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毒品走私中心。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每年大约有50多吨来自拉美和阿富汗的可卡因和30多吨海洛因从这里流向欧洲。^[25]乌伊运（IMU）则既是一个恐怖组织，又是一个贩毒组织。恐怖组织与犯罪组织在活动形态、组织结构等方面的一体化，已经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26]

第七，成员构成方面出现西方化趋势。美欧等西方国家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首要袭击目标。特别是美国，更是基地眼中必须袭击的“蛇头”。过去，基地组织通过向美国派遣恐怖分子的形式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9·11”事件以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纷纷强化了国内安保措施，加强了安检力度。2002年11月美国正式将机场安检业务从私人承包商手中收归政府，于2010年11月起在美国机场实施严格的搜身安检措施。同时，美国还对进出美国国境的外国公民采取严格的生理特征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基地组织分子向美国境内渗透的难度上升，开始通过各种手段从美国和欧洲各国内部招募成员，进而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27]

结 语

基地组织与传统军事伊斯兰组织的主要目标虽然都是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但基地组织认为首先要打击支持这些世俗政权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而非直接打击本国政权。^[28]这也是基地组织获得中东穆斯林民众支持或同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此，尽管遭受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阵营的严厉打击，但基地组织仍然以新的形态生存下来，并有发展壮大趋势。作为一个学习能力强、适应性强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经常能够找到国际反恐阵营的漏洞与缺陷，寻找到新的人员招募与训练场所。特别是针对那些年轻的极端主义网民，互联网更使基地组织获得了传统传播手段不可比拟的宣传与动员优势。在2010年12月延续至今的中东大变局中，很多人曾乐观地认为中东民众有了暴力与冲突以外的民主选项，基地组织也将因陷入中东国家的内部冲突而损害自己的道德优势，这将不仅压缩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也将削弱基地组织的民众基础。^[29]但是中东国家的内部动乱以及伊斯兰势力的纷纷抬头表明，即使基地组织的民众基础可能会有所削弱，但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等国的动乱局面，也给基地组织提供了机会与活动空间^[30]。特别是欧美国家那些通过互联网接受圣战思想并进行初步恐怖主义训练的新一代基地分子，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实战训练场所。^[31]更重要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场冲突与战争培育了大约1万至3万名穆斯林外国战士，^[32]构成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当代伊斯兰圣战运动和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人员基石。即使基地组织以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暴力与冲突思想因中东政治动荡而相对削弱，但它们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有号召力的恐怖主义符号。并且，随着其战略转型，存在基地组织有与当地势力和武装结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的可能性。未来，基地组织可能演变成一种融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暴力活动为一体的恐怖—政治复合体。

注释：

[1] Leah Farrell, "How Al Qaeda Works: What the Organization's Subsidiaries Say about Its Strength",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128-138.

[2] Periodical Review: Summary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Jihadist Forums, The Second Half of April 2011. <http://www.ict.org.il/LinkClick.aspx?fileticket=Sw3Z9CGx1E8%3d&tabid=344> 2011-6-18

[3] 指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参与反抗运动的、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自愿者和“圣战士”。

[4] 现任领导人为阿布·巴格达底 (Abu Bakr al-Baghdadi)。

[5] Jon Altermen and Rick "Ozzie" Nelson, "AQAP in Yemen", *CSIS Critical Questions*, November 5, 2010, <http://csis.org/publication/aqap-yemen>; and Greg Miller and Peter Finn, "CIA Sees Increased Threat for al-Qaeda in Yeme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4,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q-dyn/content/article/2020/08/24/AR2010082406553.html>, access at 2012-4-22

[6] Leah Farrell, "How Al Qaeda Works: What the Organization's Subsidiaries Say about Its Strength", p. 134.

[7]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p.151.

[8] Dina Temple-Raston, "Al-Shabab Becomes Magnet for Would-Be Jihadists", August 6, 2010,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9021164>, access at 2012-4-23; and Spencer Hsu and Carrie Johnson, "Somali American Recruited by Extremists: US Cites Case of Minnesotan Killed in Suicide Blast in Africa",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2009.

[9] Petter Nesser, "How did Europe's Global Jihadis Obtain Training for Their Militant Cause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20, 2008, p.234.

[10] Jerome P. Bjelopera and Marck A. Randol, "American Jihadist Terrorism: Combating A Complex Threa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7, 2010, p.34.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53298.pdf>, access at 2012-4-22.

[11] Rick "Ozzie" Nelson and Thomas M. Sanderson, "A Threat Transformed: Al Qaeda and Associated

Movements in 2011”, CSIS, February 2011, p.14.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10203_Nelson_AThreatTransformed_web.pdf, access at 2012-4-23.

[12] “Online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with Abu Zubayr Adel al-Abab, Shariah Official for Member of 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 18 April 2011.

http://icsr.info/news/attachments/1306407042ICSR_Abab__Translation.pdf, access at 2011-5-30.

[13] Matthew Levitt, “Money Troubles: The Financial Woes of Al-Qaeda’s Leaders”, IHS Defense, Security and Risk Consulting, January 2012, p.28.

<http://www.cfr.org/terrorist-organizations/al-qaedas-financial-pressures/p21347>, access at 2012-3-23

[14] Muhammad Saiful Adli Ayob and Muhammad Haniff Hassan, “Osama’s demise and Zawahiri’s Rise: Weakening of Al Qaeda”, RSIS Commentaries, No. 105/2011 dated 15 July 2011. www.rsis.edu.sg, 2012-4-20.

[15] Rohan Gunaratna, “Al Qaeda under Ayman Al Zawahiri: Still A Lethal Organisation”, *RSIS Commentaries*, No. 104/2011 dated 15 July 2011. www.rsis.edu.sg, 2012-4-20.

[16] 魏来：“扎瓦希里：‘基地’组织新首领”，载《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7期，第23页。

[17] 张金平：“‘基地’组织恐怖活动变化与也门反恐态势”，载《亚非纵横》2011年第2期，第30页。

[18] 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

[19] Wojciech Gryc, “Al Qaeda: Corporate Hierarchy or Biological Entity”, <http://i2r.org/alqaeda.pdf>, access at 2012-4-21.

[20] John Turner, “From Cottage Industry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Salafi-Jihad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Al Qaeda Ideology”,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22, 2010, pp.541-558.

[21] Jonathan Kennedy and Gabriel Weimann, “The Strength of Weak Terrorist Tie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2011, p.203.

[22] Michael Page, Lara Challita, and Alistair Harris, “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aming Narratives and Prescription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23, 2011, pp.150-172.

[23] Jonathan Kennedy and Gabriel Weimann, “The Strength of Weak Terrorist Ties”, pp.201-212.

[24] Johan T. Picarellip, “Osama Bin Corleone? Vito the Jackal? Framing Threat Convergenc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4, 2012, p.181.

[25] 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第72页。萨赫勒指撒哈拉沙漠南缘向非沙漠地带过渡的地区，是一条宽320 - 480公里的半沙漠地带。萨赫勒四国则专指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巴里和尼日尔。

[26] Johan T. Picarellip, “Osama Bin Corleone? Vito the Jackal? Framing Threat Convergenc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p.188-190; Victor Asal and Kathleen Deloughery, “When Politicians Sell Drugs: Examining Why Middle East Ethno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re Involved in the Drug Trad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4, 2012, pp. 199-212.

[27] Matthew Levitt, “Money Troubles: The Financial Woes of Al-Qaeda’s Leaders”, p.30.

[28] Rick “Ozzie” Nelson and Thomas M. Sanderson, “A Threat Transformed: Al Qaeda and Associated Movements in 2011”, CSIS, February 2011, p.4.

[29] 魏来：“扎瓦希里：‘基地’组织新首领”，第25页。

[30] Matthew Levitt, “Money Troubles: The Financial Woes of Al-Qaeda’s Leaders”, p.31.

[31] Petter Nesser, “How did Europe’s Global Jihadis Obtain Training for their Militant Causes?” p.250.

[32] Thomas Hegghammer, “The Rise of Muslim Foreign Fighters: Isla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Jiha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3, Winter 2010/11, p.53.

（作者简介：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340；朱道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340）

收稿日期：2012年3月